

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事件中英国报刊 “舆论一致”现象研究*

叶 亢**

内容提要 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是英帝国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改变了整个中近东的国际格局。1881年9月奥拉比兵谏后，英国舆论开始密切关注埃及，舆论呈现纷繁芜杂的局面，英国大报是舆论的核心。1882年初奥拉比掌权后英国舆论出现了两大阵营，其中的战争派对和平派进行全面压制。亚历山大骚乱后，舆论要求英国单独出兵解决埃及危机，反对的声音很少。这种“一致的”战争舆论出现在英国政府做出决策之前。从公众舆论形成的视角对此事件进行研究，会发现此时的英国报业处于“自由”时期，但依然形成了“一致的”舆论。英国的大报在舆论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大报的幕后推手来自在埃及的少数英国人。少数人制造舆论奠定了“舆论一致”的民意基础。本文以此个案研究来反思西方自由主义媒介理论。

关键词 英国 埃及 奥拉比起义 “舆论一致”

1882年英国为何会占领埃及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外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过这个问题，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①例如从经济角度来考察这一事件，有学者指出英国用武力占领埃及是为了维护英国债权人的利益。霍布森就认为英国占领埃及是19世纪以来英国对埃及进行经济渗透的结果。从英国的战略地位来考察这一问题，洛威认为通往印度之路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是英国出兵埃及的动机。从英帝国的“责任”角

* 本文系深圳市哲学社科规划2021年度课题“英国的中东殖民知识生产与传播（1800—1914）”（SZ2021C022）的阶段性成果。

** 叶亢，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① 叶亢：《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问题研究述评》，《暨南史学》2017年第1期。

度来研究埃及事件，学者们认为英国占领埃及是对埃及局势做出的回应，是遵守所谓的“道义”、履行帝国“责任”的表现，等等。从公众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英国自由党在帝国问题上与保守党趋于一致，欲极力扩大帝国的版图。^①

1882年英国发兵埃及前，英国报刊对埃及事件的态度几乎“一致”，即大多数报刊认为，传统的英国对埃及政策已经不能解决埃及问题，英国必须对埃及采取强硬措施，迅速用武力推翻奥拉比的统治。为什么如此多的报刊在此问题上发出“一致”的声音？1882年，英国报刊处于“自由”时期，为何依然会出现“舆论一致”的现象？本文从“舆论一致”形成的角度来考察这一历史事件。这种现象为何会出现？有幕后推手吗？幕后推手是谁？制造舆论的原因是什么？以此事件为个案研究，来重新反思西方自由主义媒介理论。

一 奥拉比事件与英国报刊的“舆论一致”

一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报刊对埃及的关注并不多。英国在中近东地区推行的政策是通过自由贸易来维护帝国利益。由于修建苏伊士运河，埃及向英国举借外债，埃及陷入了债务危机，英国趁机成为埃及的主要债权人。同时，英国为了进一步控制近东局势，与法国一起在埃及建立了“双重监督体系”。英法两国各任命一名财政总监“监督”埃及经济。英法两国对埃及的控制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反抗，埃及国内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以奥拉比为首的埃及本土军官要求进行改革，逐步实现埃及的自治。1881年9月9日奥拉比发动兵谏，提出了三点要求：撤换政府、实行宪政、增加军队数量。在英国与奥拉比等人协商后，埃及局势恢复平静，但是却激起了英国舆论激烈的讨论。

（一）奥拉比九月兵谏与英国报刊的“自由讨论”

英国报刊对于奥拉比兵谏的讨论，出现了不同的论调，众说纷纭。一

^① 叶亢：《从英国公众舆论的视角解析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事件》，《新史学》（第二十五辑），大象出版社，2020。

些报纸指出土耳其是英国处理埃及危机的关键，可派土耳其军队到埃及解决危机，这种观点可称为“土耳其干涉论”。这些报纸之所以强调土耳其的作用，是因为英土关系一直是英国维持地中海局势的重要支柱之一。英国希望通过奥斯曼帝国达到间接影响埃及的目的。《格拉斯哥先驱报》称“现在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最安全的方法是让苏丹行使他的宗主权”。^①《自由人报》认为埃及名义上是土耳其的附属国。“在英法两国的监督下，让土耳其干涉埃及名正言顺。”^②《莱切斯特纪事报与莱切斯特郡信使报》指出要考虑宗主国的权益，“土耳其干涉足以解决现在的问题，也不会损害任何欧洲大国的尊严”。^③舆论认为土耳其以宗主国的名义出兵埃及最为合理。当然，舆论中也存在反对土耳其干涉的声音。《邓迪信使报和阿格斯与北方守护者》指出“土耳其肯定会提出条件，要求实际统治埃及，而不是现在名义上的宗主权。但是这种要求西方国家绝不会答应”。^④《贝尔法斯特新闻报》指出“从表面上看土耳其是埃及的宗主国，我国必须要维持土耳其的这个地位。如果苏丹对埃及有企图，英法两国应该采取措施坚决反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苏丹干涉埃及”。^⑤支持和反对土耳其干涉的声音都是存在的。

一些报纸提出“埃及自治论”，为了维护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解决埃及危机的方式是“埃及自治”，让埃及自己管理自己。《劳埃德周报》指出：“英法在埃及的利益并不一致，虽然有英法双重监督体系，但是迟早会发生冲突。对于我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条通往印度的水路必须安全。埃及自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⑥舆论中也存在反对“保持现状”的声音。它们认为埃及危机并没有解决，对埃及现状表示不满。《艾克赛特旗帜报》指出：“目前解决埃及危机的形式只是一种临时的妥协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埃及问题。”^⑦《特鲁曼的艾克赛特邮报》指出埃及的危机以妥协的方式结

① “Egypt,” *Glasgow Herald*, September 13, 1881, p. 4.

② “Egypt,” *Freeman's Journal*, September 12, 1881, p. 3.

③ “Egypt,” *Leicester Chronicle and the Leicestershire Mercury*, September 17, 1881, p. 4.

④ “Egypt,” *The Dundee Courier & Argus and Northern Warder*, September 13, 1881, p. 4.

⑤ “Egypt,” *Belfast News-Letter*, October 8, 1881, p. 4.

⑥ “Egypt,” *Lloyd's Weekly Newspaper*, September 25, 1881, p. 4.

⑦ “Egypt,” *Exeter Standard*, September 17, 1881, p. 4.

束,这种方法严格契合了格拉斯顿在南非所执行的路线。“我国不希望与法国引发不必要的争端,但是必须教训埃及这些暴民。”^①该报认为保持现状并不能真正解决埃及危机。

发动兵谏的是以奥拉比为首的埃及军队,因此一些英国报纸认为只要消灭埃及叛军,危机就会自动消失。要如何解散埃及军队呢?这些报纸认为英法两国可以派军舰到埃及以威慑的方式让埃及军队屈服。《贝尔法斯特新闻报》支持“武力威慑论”。该报指出:“英法两国应该派一两艘舰船去埃及解散埃及军队。”^②该报同样强调英法两国采取武力威慑的方式绝对不是要占领埃及,而是要教训埃及军队。《波美公报》《晨报》等报刊反对“武力威慑论”。《波美公报》指出:“武力威慑的方法根本不能解决埃及危机,这种方式只会使埃及局势更加复杂。”^③《晨报》指出:“如果英法两国能够共同执行这种军事示威政策是最好的。但是这种方式只会使埃及局势恶化,根本不能解决问题。”^④该报明确反对“武力威慑论”。

奥拉比为何要发动九月兵谏,有报纸怀疑有人在背后指挥奥拉比采取行动,目的是让埃及陷入混乱。《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埃及危机》的文章。作者乔治·P·巴杰(George Percy Badger)提出“埃及阴谋论”。巴杰指出有人暗中支持奥拉比等人,让埃及出现混乱局面,趁机浑水摸鱼重返埃及。他认为这背后的主谋是前赫迪夫伊斯梅尔。巴杰认为伊斯梅尔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私人原因。伊斯梅尔不甘心被逐出埃及。据说伊斯梅尔离开埃及时带走了大量钱财,他有能力操纵埃及的那些阴谋家”。因此解决埃及危机的方式是“消除伊斯梅尔的阴谋”。^⑤

《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九月兵谏表明埃及赫迪夫的地位岌岌可危。当时的赫迪夫陶菲克是靠西方大国扶植上台的,埃及人知道他们的赫迪夫只不过是英国与法国的工具。“有人认为这次军事示威是土耳其的阴谋,素丹想重返埃及。虽然军事示威并不针对埃及人民,但是军队要求实行宪政以及增加军队的数量却非常奇怪,因此军队背后应该有其他支持的

① “Egypt,” *Treman's Exeter Flying Post*, September 28, 1881, p. 4.

② “Egypt,” *The Belfast News-Letter*, September 15, 1881, p. 4.

③ “The Egyptian Crisis,” *Pall Mall Gazette*, September 28, 1881, p. 3.

④ Miles, “The Occupation of Egypt,” *Morning Post*, October 13, 1881, p. 6.

⑤ George Percy Badger, “Egypt Crisis,” *The Times*, September 19, 1881, p. 4.

力量。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可以看出埃及的外部环境非常复杂。”^①这篇文章认为土耳其为了重新控制埃及，在幕后操纵奥拉比制造了此次兵谏，这种观点被称为“土耳其阴谋论”。

还有一些报纸提出“保持现状论”。他们认为奥拉比兵谏并没有损害英国的利益，埃及已经恢复平静，因此可以保持现状。“保持现状论”的核心观点是认为英法两国合作可以解决埃及问题。英法关系是英国处理埃及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支柱。《伯明翰每日邮报》认为既然危机很快过去，而英法两国都不想在埃及部署新的军事力量，那么“保持现状就是最好的选择”。^②《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英国决不允许埃及陷入混乱。“如果赫迪夫不能维持埃及秩序。我们相信外国的压力足以解决问题。”^③

从表面上看，英国舆论对于埃及局势进行自由讨论，没有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扰。实质上，对参与讨论的报纸进行研究会发现，虽然各报在英国的发行地点不同，但是信息来源非常局限。此时的英国报纸在刊登消息时都会注明出处，《泰晤士报》《每日新闻》《波美公报》《每日电讯报》《旗帜报》《晨报》《观察家》为主要信息源。英国的大多数报纸会引用一份伦敦大报或者几份大报的消息，它们的评论基本围绕着重大的观点进行讨论。整体来看，英国大多数报纸提出的看似独立的观点实质上受到伦敦大报的影响。随着埃及局势趋于缓和，大报基本上支持“保持现状”。虽然某些大报对于“保持现状”表示担忧，但是“保持现状”成了舆论的基本论调。

（二）奥拉比主政与英国报刊的论战

1882年初，英国与法国共同签署的《联合备忘录》让奥拉比等人认为英国与法国可能武装入侵埃及。在此局势下，以奥拉比为核心的祖国党成立新内阁。新政府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改革让埃及强大，逐渐实现自治，但并没有完全动摇英法的“双重监督体系”。

奥拉比新内阁的出现导致英国舆论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战争派”和“和平派”。以 W. S. 布伦特 (W. S. Blunt)、W. H. 格雷戈里 (W. H. Gregory)

① “Egypt,” *Daily News*, September 14, 1881, p. 4.

② “Egypt,” *Birmingham Daily Post*, September 12, 1881, p. 4.

③ “Egypt,” *Manchester Guardian*, September 13, 1881, p. 4.

为代表的“和平派”支持奥拉比领导的埃及民族运动。他们认为在英国的“监督”下，埃及通过自治的方式可以实现繁荣与进步。英国根本不需要采取任何战争手段。以《利兹信使报》《经济学家》《旁观者》等为代表的报纸支持“和平派”。《利兹信使报》指出“奥拉比是一位爱国者，我国的公众对于奥拉比有所误解。奥拉比领导的运动是一场‘民族’运动”。^①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奥拉比及其领导的“祖国党”的行动。《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希望今后能够与祖国党友好合作，逐步实现埃及自治”。^②《旁观者》认为“现在并不需要任何军事干涉，埃及有权利自治，同时履行国际责任”。^③《普雷斯顿卫报》指出“从布伦特的信里我们得知奥拉比并没有推翻双重监督体系”。^④该报对奥拉比及祖国党表示同情。《伯明翰每日邮报》同样认为“奥拉比新内阁并没有破坏目前的英法双重监督体系”。^⑤对于英国政策，这些报纸支持“保持现状”。

以塞缪尔·贝克(Samuel Baker)为代表的“战争派”认为奥拉比进行军事独裁，埃及根本不存在“民族运动”。英国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用武力解决埃及危机。《西部邮报》《真理报》《阿伯丁周报》等报纸支持“战争派”。《西部邮报》指出“在开罗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军事专制政权”。^⑥奥拉比根本不惧怕英国与法国的威胁。英国政府陷入困境，根本不能采取独立的行动。《真理报》指出“奥拉比宣称自己是爱国者，为埃及的安全、自由和完整而奋斗。同时他认为军队数量必须增加，因为‘祖国党’相信军队能够维护埃及的利益，也就是说埃及军官和他的士兵准备控制埃及”。^⑦该报完全不相信布伦特发表的祖国党纲领，认为奥拉比只不过是军事独裁者。《伯明翰每日邮报》认为“埃及落入军事集团手中，我们不能无视埃及存在的危险”。^⑧《阿伯丁周报》认为“除了法国，其他欧洲国家都允许土耳其干

① “Egypt,” *Leeds Mercury*, January 6, 1882, p. 4.

② “Egypt,” *Economics*, January 14, 1882, p. 4.

③ “Egypt,” *Spectator*, February 4, 1882, p. 4.

④ “England, France and Egypt,” *The Preston Guardian*, February 11, 1882, p. 3.

⑤ “Egypt,” *Birmingham Daily Post*, February 6, 1882, p. 3.

⑥ “Egyptian Crisis,” *Western Mail*, February 4, 1882, p. 4.

⑦ “Egypt,” *Truth*, January 4, 1882, p. 4.

⑧ “Egypt,” *Birmingham Daily Post*, February 6, 1882, p. 4.

涉埃及。现在土耳其已经准备了军队，只需要欧洲大国的同意便可行动”。^①

“和平派”不断强调奥拉比的改革是埃及的民族运动，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支持改革。这些言论实际上就是维护英国首相格拉斯顿长期以来推崇的自由党的外交原则。“战争派”认为奥拉比在埃及进行军事独裁，埃及根本不可能出现民族运动。“战争派”所要维护的是英国保守党的帝国原则，该派认为奥拉比执政威胁了英帝国的利益。舆论的两大阵营为了维护各自的原则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一阶段，双方“自由”辩论，可谓势均力敌。但是，英国的大报和小报仅仅是在这两大阵营中展开讨论，以七份大报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将决定舆论变化的方向。随着埃及局势的变化，舆论两大阵营也出现了变化。

（三）“埃及危机”与英国“舆论一致”的形成

奥拉比的改革措施损害了埃及国内一些军官的利益，赫迪夫在英法两国的支持下组织新的内阁，埃及国内进步人士支持奥拉比，奥拉比仍然留任国防大臣。随着埃及局势的变化，英国报刊上出现了大量有关“埃及危机”的报道。《泰晤士报》指出“埃及很有可能发生内战”。^②另外，“据可靠消息，埃及军队要求赫迪夫迅速重组政府，中断与欧洲的通信联系。赫迪夫如果拒绝这些要求，他将被废除。埃及民众正在逃离开罗以避免在废除赫迪夫的请愿书上签字”。^③该报认为奥拉比主政引发了严重的埃及危机。《每日新闻》指出“埃及局势不容乐观。据说赫迪夫有生命危险”。奥拉比背后有埃及军队和土耳其素丹的支持，“他只不过是土耳其的工具，用来对付在埃及的外国势力，目的是在埃及重新建立土耳其的统治”。^④

对埃及局势的判断，导致战争舆论形成。“战争派”采取两种方式压制“和平派”。一是以“公开辩论”的方式打压“和平派”。“和平派”的观点遭到了全面驳斥。二是以“缺席审判”的方式打压“和平派”。此时，支持“和平派”的声音基本在英国的报刊上消失了，能读到的都是批评他们观点

① “Egypt,” *Aberdeen Weekly Journal*, May 15, 1882, p. 4.

② “Egypt,” *The Times*, May 31, 1882, p. 10.

③ “The Crisis in Egypt,” *The Times*, May 31, 1882, p. 5.

④ “The Crisis in Egypt,” *Daily News*, May 30, 1882, p. 5.

的文章。这种“缺席审判”的方式让“和平派”无从辩驳。

亚历山大骚乱使英国舆论聚焦埃及。对骚乱报道，英国大报一开始就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亚历山大骚乱的主谋以及英国政策上。大报在短时间内就确定了引发骚乱的真凶为奥拉比，其他报纸只是追随这种看法。虽然英国政府提出召开君士坦丁堡会议，与各国协商解决埃及问题，并没有确定英国要单独使用武力占领埃及，但是，英国的舆论已经“一致”，要求英国干涉埃及。1882年7月英军炮轰亚历山大，9月占领埃及。综观整个英国舆论的演变过程，伦敦的七份大报对舆论的变化起了关键作用。

二 “少数人”与“舆论一致”

从众说纷纭到两大阵营再到舆论一致的形成，推动舆论发生变化的是伦敦的七份大报。从消息来源上看，这七份报纸都在埃及派有记者，有独立的信息源，可以发表各自的观点。从政治倾向来看，《泰晤士报》和《观察家》是独立报刊，没有明显的党派立场。《每日新闻》《波美公报》《每日电讯报》倾向于支持自由党，《旗帜报》和《晨报》为保守党的报纸。这七份报纸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那么，这些大报为何在奥拉比事件上最终发表了相似的看法呢？

（一）《泰晤士报》的驻埃记者

《泰晤士报》是此时英国报道国际事件最重要的报纸之一。该报一向以独立、客观的立场在新闻界享有极高的威望。从19世纪中叶开始，《泰晤士报》就向埃及派驻记者，希望能够更准确地掌握埃及状况。该报一直是英国公众了解埃及局势的重要窗口。

从1881年9月到1882年初，《泰晤士报》驻埃及的记者是约翰·司各特（John Scott），他同时担任埃及混合法庭的法官，负责审理埃及的欧洲人案件。莫贝利·贝尔（Moberley Bell）是他的助手。由于司各特担任法官事务较多，因此发回英国的文章大多数由贝尔执笔。1882年春季后司各特被派往印度，贝尔成为《泰晤士报》驻埃及唯一的记者。

《泰晤士报》刊登贝尔从埃及发回的电报，对电报的内容并没有表示怀

疑。主要原因在于贝尔从1865年起就开始担任《泰晤士报》驻埃及的记者。他思维敏捷，勤于写作，同时与埃及赫迪夫和英国驻埃及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很快获得了认可。^①在1865~1890年，贝尔一直担任《泰晤士报》驻埃及的记者，只是由于各种事件，有过短暂的中断。即使1875年司各特成为《泰晤士报》驻埃及的正式记者，贝尔在此期间依然担任该报兼职记者，发回各种消息。

舆论中“和平派”的代表人物布伦特曾与《泰晤士报》的经理麦克唐纳见面，指出该报刊登的电报与埃及的状况不符，要求其增派一名驻埃记者，此要求被麦克唐纳回绝。麦克唐纳认为“本报驻埃记者工作认真，其观点也完全符合英国的利益，完全没有必要增派记者”。^②《泰晤士报》认为如果英帝国的利益受到损害，就应该采取战争行动维护帝国利益。贝尔的文章呼应了该报的帝国立场，影响了该报的舆论。

（二）《每日新闻》的幕后人物

《每日新闻》是自由党的喉舌，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自由党。此时该报主编是F. H. 希尔（F. H. Hill）。该报的战争舆论出现在1882年5月底。这个时期舆论出现变化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此时自由党并没有做出任何战争决策。那么《每日新闻》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呢？

在查阅档案时，笔者发现外交部副大臣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与《每日新闻》主编希尔有着密切的往来。^③迪尔克的父亲曾经长期担任《每日新闻》的主编。而在迪尔克与希尔的通信中，我们会发现迪尔克在5月给希尔的信中写道：“埃及危机非常严重，奥拉比已经控制了埃及，必须让奥拉比下台。他只不过是素丹的工具。”^④这种观点与该报5月底刊登的社论观点相似。希尔接受了迪尔克对埃及局势的判断才提出用战争方式解

① E. H. C. Moberley Bell, *Life and Letters of C. E. Moberley Bell*, London: John Murray, 1927, p. 53.

② Wilfred S. Blun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London: T. F. Unwin, 1907, p. 183.

③ S. Gwynn and G. M. Tuckwell, *Sir Charles Dilke*,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1917, pp. 4, 315.

④ “Dilke Dairy,” 1882, British Library, Add. MSS 43898 and Add. MSS 43924.

决埃及危机。

迪尔克为何会在5月认定埃及危机已经很严重?他的依据是什么呢?C. H. 张伯伦(C. E. Chamberlain)认为迪尔克在英国占领埃及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①当时作为外交部副大臣的迪尔克并不是内阁成员,但在外交部有重要地位。1882年1~5月,其间英国政府还没有考虑用战争方式解决埃及问题,此时迪尔克不断地阅读来自埃及的公文,他对埃及形势做出的判断与这些公文有密切关系。

给英国外交部不断发文件的是英国驻埃及总领事马列特。他对埃及局势的描述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在奥拉比主政之前,马列特一直宣称他有信心“管理”埃及民族主义者。^②1882年2月4日,奥拉比内阁上台。自此后马列特写给外交部的公文有明显变化。马列特传给英国外交部的信息是整个埃及局势极其紧张。奥拉比政府控制埃及,损害了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英国要采取措施解决埃及危机。外交部多次提出希望更多地了解奥拉比政府并寻求与埃及政府进行协商的主张,马列特对这些提议给予坚决抵制。英国政府认为可以和平解决埃及危机,但是马列特认为必须采取战争手段。

马列特不断传送的公文影响了迪尔克对埃及局势的判断,进而影响了《每日新闻》的舆论。

(三)《波美公报》的神秘权威

当时英国的报纸上不会刊登记者的姓名。多年后,奥拉比事件早已成为历史。在《牛津名人传记词典》中记载了众多政治人物的生平,《波美公报》驻埃及的记者是克劳德特·科尔文(Auckland Colvin),此人在1881~1882年同时担任英国驻埃及财政总监。^③

《波美公报》受到科尔文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该报舆论的变化与科尔文观点的变化具有同步性。科尔文对于埃及问题的看法体现在他提交给外交

① M. E. Chamberlain, "Sir Charles Dilke and the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Egypt 1882," *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 1976.

② "Malet to Granville Private," January 23, 1882, Public Record Office 30/29/160.

③ "Sir Auckland Colv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部的备忘录中。他的观点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奥拉比九月兵谏后，科尔文认为兵谏并没有改变英国在埃及的地位，英国的政策可以保持不变。奥拉比组阁后，科尔文抛弃了以前的看法，他指出维持现状已经不能解决埃及问题，要采取镇压的手段解决危机。此后，科尔文在备忘录中不断强调埃及局势混乱。而《波美公报》也大量刊登了关于“埃及危机”的文章，科尔文利用自己的记者身份将这些观点传达给报纸。

其次，《波美公报》报道的重心与科尔文强调的内容一致。《波美公报》在讨论埃及问题时关注的核心是经济问题，而科尔文作为英国驻埃及的财政总监，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管理埃及经济事务。他不断向报纸灌输埃及发生经济危机的思想，这将产生严重后果。该报经常出现《埃及股票危机》《埃及债券崩溃的影响》等文章，评论埃及局势危险，可能对埃及股票市场造成严重影响。《波美公报》的观点基本与科尔文的观点吻合，极力鼓吹奥拉比政权对埃及经济的破坏。

最后，科尔文通过《波美公报》对布伦特和格雷戈里等“和平派”的言论进行攻击。《波美公报》在4月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完全否定布伦特对埃及局势的介绍。布伦特曾指出埃及局势稳定，没有伦敦大报所说的“恐慌”“混乱”局面。该文认为“布伦特与奥拉比这些叛军关系密切。埃及人都支持赫迪夫，反对奥拉比进行军事独裁”。^①《波美公报》称这篇文章来自一位“权威”人士的消息。科尔文就是那位“神秘权威”。^②

（四）《旗帜报》《晨报》《每日电讯报》《观察家》中的影子人物

《旗帜报》是保守党最重要的报纸，《晨报》代表保守党中托利派的观点。《每日电讯报》是自由党报刊。《观察家》是独立报刊。这四份党派性质不同的报纸为什么会有一致的看法呢？

不同的记者对埃及局势的报道非常相似，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布伦特认为是由于英国驻埃及总领事马列特对新闻进行监督。此时的英国报业并不存在新闻审查制度。但是，在国外新闻的传播中却存在隐性的“监督”。

① “Ourabi Pasha and His Assertions,” *Pall Mall Gazette*, April 24, 1882, p. 4.

② M. E. Chamberlain, “British Public Opinion and the Invasion of Egypt, 1882,” *Trivium*, Vol. XVI, 1981, p. 15.

布伦特写道：“发往伦敦的电报要受到马列特的监督。这种新闻监管的方式几乎存在于英国驻国外的所有外交机构中，而这成为误导国内公众的最有害的方式。这种情况在埃及尤其严重。据我所知，在埃及出现重大危机时，才会有众多记者进入埃及，新闻监督就会比较困难。而平时，英国国内报纸派驻开罗或者亚历山大的记者极少。哪些新闻应该被发往伦敦，哪些从伦敦传来的新闻应该在埃及发表，这些都由我国驻埃及的官员控制。”^①

另一个证据来自《每日新闻》上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埃及危机》。作者 H. P. 罗什 (H. P. Roche) 指出驻外领事在控制信息中的作用。“在东方工作的领事们，有些人为了维护他们国家或者自己的利益，通过一些报刊的记者，将一些恶意的信息发回国内，刺激危机产生的力量往往掌握在一些普通人的手中。”该文接着指出“奥拉比想让世界知道，那些欧洲的领事们所拥有的隐形力量是如何刺激危机产生的”。^② 这里的“隐形力量”就是指控制信息的力量。虽然在这篇文章中没有直接点名，但是间接地指出了埃及总领事马列特控制消息、煽动舆论的事实。

布伦特和格雷戈里之所以能够逃脱马列特的新闻监督，主要由于他们是独立的作者，也都曾经为外交部工作，非常清楚外交部门的新闻审查程序。虽然他们都为《泰晤士报》撰写文章，但是以个人的身份进行写作，没有使用记者的身份。马列特对付普通记者的办法在布伦特和格雷戈里身上并不奏效。布伦特指出“马列特会将消息优先给那些他信任的报刊”。由于平时只有几家英国大报在埃及派驻记者，这些记者基本上都从领事馆获取消息，因此，以上几份报纸虽然派往埃及的记者不同，报纸代表的党派利益不同，但是刊登的消息却非常相似。

比较马列特的公文与报刊上刊登的电报，布伦特的说法可以得到验证。《每日新闻》在 1882 年 5 月 17 日刊登了一份切尔克斯族军官的报告，这位军官详细叙述了他被奥拉比手下的士兵“虐待”屈打成招的过程。而这份报告的全文也出现在 5 月 16 日马列特给外交部的公文里，唯一的区别是

① Wilfred S. Blun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London: T. F. Unwin, 1882, p. 150.

② “Egyptian Crisis,” *Daily News*, July 4, 1882, p. 4.

《每日新闻》在刊登这篇报告时省略了作者的名字。^①

虽然也存在逃脱监督的例子，但是马列特用其他的方式解决了此问题。《每日电讯报》在6月初特派一名记者到埃及了解情况。这名记者是德鲁·盖伊（Drew Gay）。此人到埃及后不久就向国内发回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奥拉比一再强调必须让马列特离开埃及，更换英国总领事。“奥拉比认为马列特既不懂埃及的语言也不理解埃及的状况。马列特必须离开埃及，必须由其他人代替，那个人必须少一些成见。”^② 该记者指出“奥拉比非常谦逊，对英国的态度良好。他获得了大量民众、大部分的军人和贝都因人的支持。如果让奥拉比离开埃及，必定会造成极大的混乱”。^③ 总之，该记者对奥拉比报以同情。

在这篇文章中，奥拉比反复提到“马列特对埃及有偏见，必须让马列特离开埃及”。这种说法激怒了马列特。他在给格兰维尔的信中写道：“《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德鲁·盖伊来到埃及，他成为布伦特和奥拉比之间的联络人。事实上，奥拉比仇视我就像他仇恨赫迪夫一样。盖伊采访了奥拉比，他在文章中诋毁我。”^④ 此后在《每日电讯报》上再也看不到从埃及发回的同情奥拉比的文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七份大报的观点受到了幕后推手的影响。《泰晤士报》的舆论受到了驻埃及记者的影响。《每日新闻》的观点受到英国驻埃及官员的影响。《波美公报》驻埃及记者就是英国驻埃及财政总监科尔文，科尔文对报纸施加影响。《旗帜报》《晨报》《每日电讯报》《观察家》虽然都各派记者到埃及，但是受到英国驻埃及总领事马列特的新闻监督。

三 “少数人”制造舆论的原因

马列特、科尔文和大报驻埃记者通过各种方式影响英国舆论。在奥拉比事件上，他们作为亲历者对埃及局势的判断对整个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

① Edward Malet, *Egypt*, London: Chiswick Press, 1909, p. 307.

② “Egyptian Crisis,” *Daily Telegraph*, June 13, 1882, p. 5.

③ “Egyptian Crisis,” *Daily Telegraph*, June 13, 1882, p. 5.

④ “Malet to Granville Private,” June 12, 1882, Public Record Office 30/29/160.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影响舆论呢?

(一)《泰晤士报》驻埃记者:莫贝利·贝尔

莫贝利·贝尔除了担任《泰晤士报》的记者,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英国商人。贝尔的父亲是欧洲商业协会的会员,也是一家英国棉花公司的合伙人。他的哥哥在亚历山大的皮尔商行(Peel & Co.)工作。此商行是英国人在埃及开设的一家从事棉花和小麦贸易的公司。1865年,贝尔在英国完成学业后返回埃及,进入皮尔商行工作。1866年,贝尔的妹妹路易莎嫁给了埃德蒙德·卡弗(Edmund Carver),此人是卡弗公司(Carver Brothers)的董事长,此公司是英国在埃及最重要的棉花公司之一。1873~1875年,贝尔担任皮尔商行棉花部门的经理。后来由于公司的内部纷争,1875年初他被迫辞职。在皮尔商行工作的十年,让贝尔积攒了大量棉花交易的经验。随后,贝尔在巴达特(Badart)商行工作,这家商行也从事棉花的转口贸易。

从贝尔的经历可以看出,贝尔及其家人都是在埃及从事棉花贸易的商人。贝尔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在埃及的英国商人,特别是棉花商的观点。英国棉花商在埃及经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的许多大家族都在埃及从事棉花贸易,例如普兰塔家族(J. & P. Planta)在埃及开始集中从事棉花贸易。查尔斯·吉尔(Charles Gill)在亚历山大开办了卡弗公司的分公司(Carver Brothers and Gill)。卡弗公司后来成为英国最大、最重要的棉花公司之一。^①

1880年,英国已成为埃及的主要贸易国之一,它同埃及的贸易占埃及出口的80%,进口的44%。埃及棉花在英国市场的份额占到12%。^②到19世纪末,英国一直主导埃及的棉花贸易。英国棉花商人在埃及的棉花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因此,英国棉花商的利益与整个埃及经济密切交织在一起。

1882年初奥拉比新内阁上台后,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触动了英国商人的利益。例如,奥拉比政府颁布了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赋予埃及议会以重要权力,特别是议会有权讨论、通过与国债、贡赋有关的国家预算。新宪法第38条规定:“政府和第三方签订的所有合同或者条约

① “Egypt,” May 3, 1864, Foreign Office 78/1818.

② Thomas Ellison, *The Cotton Trade of Great Britain*, Bristol: Thoemmes Press, 1999, p. 91.

以及优惠协议只有议会投票确定才算合法。”^①在这部新宪法颁布之前，埃及议会没有任何权力干涉经济问题。所有的经济问题由英法财政总监共同决定，特别是英国的财政总监，基本控制了埃及的经济。这种隐形控制的方式使在埃及从事贸易的英国商人获利颇丰。一旦英国财政总监不能完全掌控埃及的经济，英国商人的利益就没有了保证。

奥拉比政府的改革措施损害了英国商人的利益，特别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英国棉花商人的利益。因此，像贝尔这样的棉花商，为了维护自己在埃及的商业利益，必然会想尽办法让奥拉比下台。贝尔利用自己的记者身份，通过英国报刊向国内传播“埃及危机”的消息。随着“埃及危机”加重，英国政府必然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奥拉比下台是迟早的事情。

（二）英国驻埃及总领事：爱德华·马列特

爱德华·马列特在1879~1883年担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作为总领事，他一方面向英国外交部递交公文，汇报埃及的状况以及为政府提供建议，另一方面对传回英国的新闻进行监督。因此，马列特对英国舆论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泰晤士报》驻埃及记者莫贝利·贝尔经常与马列特联系，他在书中对马列特的评价能够很好地反映这位外交官的性格。贝尔认为马列特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不够自信。“1879年，马列特来到埃及工作。他发现一切进展顺利，而这归功于‘不犯错误’。马列特认为‘不说’和‘不做’会让人觉得厌烦，但是要尽量小心采取行动。刚到埃及时，马列特很顺利地对他迪夫陶菲克施加影响，并发现通过引导的方式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1880年8月，由于他成功地促成《清算法》的签订，英国外交部授予他K. C. B.勋章。”^②马列特曾写道：“《清算法》的签署非我的功劳，对于这个勋章受之有愧。当我回到伦敦，收到了许多贺信。他们给予我许多鼓励和支持。”马列特还特地在他的著作中展示了德比勋爵和迪尔克的贺信。德比在信中写道：“祝贺您获得这一荣誉，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坚信终有一天您将成为最出色的外交家。”时任外交副大臣的迪尔克的贺信是：“祝贺您获得K. C. B.

① “Egypt, No. 4, Edward Malet to Granville,” January 16, 1882, Parliamentary Paper.

② C. F. Moberley Bell, *Khedives and Pashas*, London: Sampson Low, 1884, p. 110.

勋章。您的能力早已超过了您现在的职位。但是这一职位绝对比大使的职位更加重要。除了您，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个职务。”最重要的贺信来自格拉斯顿：“我对您获得这一荣誉表示祝贺。感谢您在埃及的辛勤工作。”^①

贝尔指出：“当马列特回到英国接受荣誉勋章时，他被认为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家、一位外交界冉冉升起的新星。”^②但是奥拉比九月兵谏突然爆发，对马列特是个打击。马列特认为在他离开埃及的短暂时间，埃及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就在他前往君士坦丁堡时，奥拉比发动兵谏。马列特对埃及形势的判断完全失误。奥拉比兵谏出乎他的预料，外交部为此事责备马列特。马列特指出“恐怕在埃及事务上，我很难不犯错误”。^③奥拉比兵谏让马列特对自己处理埃及问题的能力产生动摇，很能反映马列特性格中不自信的一面。在研究英国占领埃及问题时，皮特·曼斯菲尔德（Peter Mansfield）也指出马列特“虽然很有野心，但是非常不自信”。^④

另外，贝尔认为存在一个“蓝皮书（Blue Book）中的马列特”。“蓝皮书”是马列特提供给英国外交部的文件。贝尔指出：“马列特总是在揣摩外交部的想法，他希望写的公文能够让外交部满意。他总是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以免犯错。但是当马列特追随科尔文的领导后，公文中所反映的是马列特的观点还是科尔文的观点就很难分清。”^⑤马列特既希望获得外交部的赏识，又担心犯错，这促使他在处理埃及问题时更愿意听从科尔文的意见。

贝尔认为，“从1881年9月到1882年7月发生的事情，所有的责任应该由科尔文来承担。一开始，科尔文想安抚奥拉比，提拔他担任埃及国防副大臣，科尔文认为可以和平地解决所有问题。当他在1882年初发现他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他坚决地选择用战争方式解决问题。而马列特只是坚决地跟科尔文保持同一立场而已”。^⑥贝尔的这个论断得到了其他当事人的认同。毕曼是英国驻埃及领事馆的职员，他写道：“自从科尔文下定决心要

① Edward Malet, *Egypt*, London: Chiswick Press, 1909, p. 105.

② C. F. Moberley Bell, *Khedives and Pashas*, London: Sampson Low, 1884, p. 111.

③ C. F. Moberley Bell, *Khedives and Pashas*, London: Sampson Low, 1884, p. 115.

④ Peter Mansfield, *The British in Egypt*, London: I. B. Tauris, 1971, p. 455.

⑤ C. F. Moberley Bell, *Khedives and Pashas*, London: Sampson Low, 1884, p. 116.

⑥ C. F. Moberley Bell, *Khedives and Pashas*, London: Sampson Low, 1884, pp. 113-116.

用武力干涉解决埃及问题，就不会有任何改变。他极大地影响了马列特。无论是自己采用直接的方式还是通过影响马列特而采用间接的方式，他都希望达到摧毁奥拉比的目的。”^① 因此，与其说是马列特影响了英国舆论，还不如说是科尔文影响了英国舆论。

（三）英国驻埃及财政总监：奥克兰·科尔文

莫贝利·贝尔和爱德华·马列特都指出他们受到科尔文的影响。贝尔虽然否认他传回国内的稿件受到马列特的新闻监督，但是他承认“英国的财政总监是最重要的消息提供者”。^② 新闻监督不是马列特一人所为。马列特也称“我有责任追随科尔文的领导”。因此，在这三位“当事人”中，科尔文的作用相当重要。

科尔文在给英国政府的备忘录里指出：“奥拉比政府所颁布的宪法是对英法双重监督体系的破坏。我认为这个体系不仅保证每年的债务偿还以及利息支付，还要管理埃及其他的经济事务，让埃及免于陷入经济困境。因此，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事务上发出声音，而且还要关注其他与经济相关的事情。”^③

科尔文认为埃及新宪法破坏了英法“双重监督体系”。作为财政总监，科尔文在英法“双重监督体系”中拥有极大的权力。不仅对经济事务进行监管，还能够以政府顾问的名义出席内阁会议，发表意见，能向政府各部门索取报告。财政总监并不在埃及政府部门担任职务，而是采取幕后控制的方式。奥拉比政府上台后希望逐步获得管理国家的权力。奥拉比政府没有触及偿还债务和利息方面的预算，因此没有触及英法这些债权国的核心利益，但是他却触及了英法财政总监的权力。新宪法第20条规定：“议会监督所有公务人员的行为；议员有权指出任何公职人员在行使他们职责时的违法行为或者过失。”^④ 同时，奥拉比内阁解雇了一些西方列强安插

① Arden G. Hulme-Beaman, *Twenty Years in the Near East*, London: Methuen, 1898, pp. 43-44.

② C. F. Moberley Bell, *Khedives and Pashas*, London: Sampson Low, 1884, p. 118.

③ “Egypt, No. 7, Memorandum, Edward Malet to Granville,” February 13, 1882, Parliamentary Paper.

④ “Egypt, No. 4, Edward Malet to Granville,” January 16, 1882, Parliamentary Paper.

在政府中的外国官吏。这些措施明显针对在埃及政府工作的欧洲官员。

在英国议会辩论时,有人质疑在埃及政府任职的欧洲官员数量过多,并且拿高薪。外交副大臣迪尔克的回复是:“除了财政总监,英国在埃及的官员是由埃及政府任命,埃及政府在极少数情况下会要求英国政府提名官员。我不知道是否能够减少英国官员的数量。如果有能力、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人在埃及拿不到比在英国更高的工资,我很怀疑他们是否愿意在埃及工作。我国政府没有控制在埃及的外国官员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工资水平。”^①

英国政府没有控制在埃及的外国官员的数量和他们的薪酬,但是英法财政总监却拥有这个权力。两位财政总监负责监督埃及的收入和支出,同时负责任命欧洲官员以及给他们发工资。财政总监负责给“1300多名在埃及政府工作的欧洲人发工资,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工具”。^②这些欧洲人在埃及各部门担任重要职务,领取高薪。通过这些欧洲官员,财政总监协调欧洲各国债权人、银行家、投资者和商人在埃及的利益,两人成为埃及真正的统治者。

有三份报告记录了在埃及工作的欧洲官员的数量和工资水平。1882年3月13日,库克森向外交部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后来刊印在蓝皮书里。此报告中指出,有1325名欧洲人在埃及政府部门工作。其中意大利人338名,法国人320名,英国人295名,奥地利人106名,希腊人103名。这五国人加起来占欧洲官员总数的88%。而且这五国官员中的68%是在1876年以后到埃及工作的。根据这份报告提供的数据,大部分的欧洲官员每月的工资是30埃镑,只有33名官员每月的工资在100~350埃镑。^③

第二份是科尔文在1882年提供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年薪在60~180埃镑的有707名欧洲官员,年薪在720~1500埃镑的有53名,年薪在1500~2000埃镑的有15名,年薪在2000~3000埃镑的有13名,年薪在3000~4000埃镑的有2名。^④

第三份报告是马列特的报告。1882年9月11日,马列特也向外交部提

① “Egypt,” June 26, 1882, Hansard: Commons, 3/ CCLXXI.

② Alexander Scholch, “‘Men on the Spot’ and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in 1882,”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9, 1976, p. 779.

③ “Egypt,” 1882, Foreign Office 78, Vol. 3436.

④ A. Colvin, *Note on Egypt*, Alexandria, 1882.

交了一份报告。他指出在1882年1月1日,只有1067名欧洲人在埃及政府部门工作,包括300名意大利人,244名法国人,240名英国人,104名希腊人和80名奥地利人。有504名欧洲人1877年以前就已经在埃及工作,另外563人1877年才来埃及工作。欧洲官员占埃及所有官员的2%,但是工资占到16%,大约是200万埃镑。^①

另外,麦克考恩指出“1881年,有1324名欧洲人在埃及各级政府部门工作,一年的工资总额是373704埃镑,占埃及1881年全年财政收入的4.5%”。^②

埃及真的需要这么多拿高薪的欧洲官员吗?“埃及的英国调查委员会委员的年薪是1500埃镑,英国水塔总监的年薪是1700埃镑,英国铁路委员会主席的年薪是3000埃镑,英国监察委员的年薪是1100埃镑。”^③这些拿高薪的英国官员,官职明显重复,埃及根本不需要如此多的监察委员。

这些欧洲官员是否如迪尔克所说“有能力、有丰富管理经验”呢?实际情况是“许多冒险家和投资商冒充‘专家’到埃及政府工作”。^④英国占领埃及后,对这些欧洲官员进行审查。英国政府公开承认“在双重监督体系实行期间,许多毫无能力的欧洲人被雇用到了埃及政府工作。这些人依靠朋友或者亲戚关系就能获得一份简单且高薪的工作。有时候雇用他们只是为了在一位法国雇员旁边配备一位英国雇员,或者在一位英国雇员身边配备一名法国雇员”。^⑤英国占领埃及后重建埃及地政局,有80名官员被辞退,大部分是欧洲官员。辞退他们的原因是这些人完全是冗官。

从库克森和马列特的报告可以看出,大部分的欧洲官员是在1876年以后进入埃及政府工作,而这正是在英法“双重监督体系”建立后。科尔文指出:“欧洲在埃及的利益错综复杂,因此绝不允许那些埃及士兵,或者毫无经验的埃及官员管理埃及。”^⑥适合管理埃及的官员只不过是科尔文任命的官员而已。科尔文掌控埃及的人事大权。奥拉比执政后进行的多项改革

① “Egypt,” 1882, Foreign Office 78, Vol. 3441.

② J. C. McCoan, *The Egyptian Problem*, London: Macmillan, 1884, p. 21.

③ “Egypt,” June 26, 1882, Hansard: Commons, 3/ CCLXXI.

④ Alexander Scholch, *Egypt for the Egyptians! The Socio-Political Crisis in Egypt, 1878-1882*, London: Ithaca Press, 1981, p. 219.

⑤ Alexander Scholch, *Egypt for the Egyptians! The Socio-Political Crisis in Egypt, 1878-1882*, London: Ithaca Press, 1981, p. 219.

⑥ Auckland Colvin,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London: Seeley, 1906, p. 25.

中，有一项是裁汰冗员，特别是辞退在埃及工作的欧洲官员。奥拉比希望收回埃及的人事任免权，而这严重损害了科尔文的个人权力。镇压奥拉比成为科尔文维护个人权力最好的方式。

总之，科尔文利用马列特的软弱，运用与贝尔的个人关系，以及自己担任《波美公报》记者的便利，试图通过煽动英国舆论来达到推翻奥拉比的目的。而推翻奥拉比仅仅是为了维护他的个人权力，这就是“舆论一致”形成的原因。

这里也存在另外一个问题，这些科尔文委派的欧洲官员是否对科尔文的决策有影响？贝尔、马列特和科尔文实际上代表了英国在埃及的商人、官员的利益，少数人煽动舆论可能受到了在埃及的另外一些英国人的影响。此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余 论

在奥拉比事件中，英国舆论处于“自由”状态。此时的英国报界还没有形成哈贝马斯所说的“报业垄断”。英国报业垄断要等到20世纪初才形成。一份数据显示，1910年的英国晨报销售量，诺斯克里夫的公司控制了33%，皮尔森的公司占到12.4%，《晨报》集团占到15.5%，占晨报总销售量的60.9%。这三个公司也控制了82.6%的晚报销售量。^①英国报业垄断的现象在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本文所涉及的时间段报业垄断并没有形成。此时英国废除了“知识税”，因此也不存在国家完全控制报纸的情况。

奥拉比九月兵谏后，“自由”的英国报刊曾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代表了各种不同党派、团体、个人的利益。这充分显示出摆脱了政府控制的“自由”报刊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这种“自由”意见的表达是在没有危害某些人利益的情况下出现的。同时，英国舆论的中心是少数大报。只有少数大报拥有消息源，其他的报纸通过各种方式追随大报。“自由”的报界受到了报业本身机制的限制。

奥拉比执政后，舆论出现了变化。在埃及的少数当事人认为奥拉比执

^① Alan J. Lee, *The Origins of the Popular Press in England*,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76, p. 293.

政会对自身利益造成损害，开始通过多种方式对舆论进行“引导”，导致舆论两大阵营的出现。随后的“自由”讨论都只是在这两大阵营的范围内进行。当埃及局势进一步“恶化”，少数人对舆论施加更大的影响力。“战争派”通过各种方式压制“和平派”，使战争舆论成为舆论的主流。“自由”讨论的范围进一步缩小。此时的言论“自由”局限在“战争派”内部。亚历山大骚乱促使“战争派”内部的不同意见趋于统一。从表面上看，“舆论一致”是通过“自由”讨论形成的。实际上，舆论“自由”是被操纵的。舆论一致只不过是少数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制造出来的。

在奥拉比事件中，少数人能够利用媒体达成“舆论一致”，这实质上是由英国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在英帝国政策上的“趋于一致”造成的。舆论中的“和平派”支持自由党的政策，他们认为英帝国要维持现状，不需要占领更多的领土。舆论中的“战争派”支持保守党，他们认为英帝国不能保持现状，需要占领更多的领土，进而瓜分世界。最终“战争派”成为舆论中“唯一的声音”，它所体现出来的帝国情绪是对自由党帝国政策最大的打击。而自由党最终决定占领埃及，使两党在帝国问题上的立场趋同。

“舆论一致”在英国政府出兵埃及之前已经形成。正如张伯伦所说“整个英国舆论界都希望英国政府发动战争解决埃及危机，我们要顺应这种要求”。^①因此，英国政府的行动成了顺应“舆论”要求的行动、顺应“民意”的行为，具有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关键在于这种舆论如何能代表“民意”！

对埃及奥拉比事件中的英国舆论进行研究发现“自由”的舆论并不自由，舆论一致也不是在“自由”的讨论中形成的。这跟西方主流媒体理论相违背。这一理论宣称“自由的媒体对公众负责，让公众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从而推动民主发展”。^②这一理论的基点建立在对自由主义的推崇，强调媒体推动社会民主进步的光明前景上。在实践中，这一理论经常可以为政府所用，以“民意”的“自由”形成来掩护政府的政策。当然在奥拉比事件中，少数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造成舆论压力，迫使政府采取符合他们

① M. E. Chamberlain, "Sir Charles Dilke and the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Egypt 1882," *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 1976, p. 242.

② [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史安斌、董关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第4~8页。

利益的政策,这种“舆论一致”并不是掩护政府的政策。由于这些优势的存在,这一理论的实质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批判。维护这一理论的学者们将自己视为这种占主导地位的道统的维护者,因此即使这一理论存在理论与事实相悖的缺陷,他们通常也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①虽然新的媒体不断涌现,广播、电视、网络等成为重要的媒介,但是理论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变化。西方主流媒体理论获得了最为广泛的支持。^②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就会发现当现实中出现“舆论一致”现象时,该理论就会指出媒体具有独立性,能够自由地发现并且报道事实。舆论是在媒体的自由讨论中形成的,舆论一致代表着大多数的“民意”。但事实上,至少在埃及奥拉比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出,“民意”是少数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制造出来的。

[责任编辑:曹峰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① P. Scannell, P. Schlesinger and C. Sparks, eds., *Culture and Power*, London: Sage, 1992, pp. 2-10.

② [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史安斌、董关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第47页。